

* [西南历史文化研究]

主持人: 蓝 勇

主持人语: 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目前还有许多内容无人涉及,历史娱乐文化地理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四川盆地在传统时代闭塞而富足,休闲娱乐文化发达,故旧有“少不入川,老不入陕”,言富足而松懈的生活会消磨少年的斗志。不过,在我看来历史上巴蜀先民同时也是最勤奋的,难怪宋人就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看来,我们巴蜀的先民是最会生活和工作的人。所以,这里推出的《巴蜀休闲好赌风考》一文,探索四川盆地内的休闲好赌风的发展历史过程,分析产生这种风气的原因,发现今天四川盆地休闲娱乐发达不仅有传统的,而且有其深刻社会和明显环境的原因。这样,我想这不仅有探索历史娱乐文化地理的学术价值,也对于今天我们发展娱乐

文化和娱乐经济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四川盆地内饮食文化在历史上在全国就有较大的影响,而饮食文化中酒文化历史悠久,虽然经过明末清初战乱受到较大影响,但“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外来移民的酿造技术的进入与特有的传统、环境、资源的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川南黔北蒸馏酒名酒区。对于这个名酒区的形成历史,以前还无人系统研究过。冯健、赵微的《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历史成因和特征考》一文系统探索了川南黔北名酒区形成的历史、社会和环境原因,分析了名酒区特色的表现形式,研究了名酒文化对社会文化特征的影响,是一篇在历史饮食文化地理方面有开创之功的论文。其实,在我看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还十分多,需要的一是要占有资料,一是要有现实的关怀。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蓝 勇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 要: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关键词:巴蜀;休闲;好赌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6-0055-03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至今,风尚相沿。

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就记载蜀中风情:郗公从禽,巷无行人。

晋左思在《蜀都赋》一文中也写道:“若夫王孙之属,郗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古代的从禽从戏、从禽之娱,一般认为是打猎。对此《山堂索考》卷七十九就谈到唐玄宗在“听政之暇从禽自娱”,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感觉也好像是在宫殿内的娱乐休闲打猎。这里谈到的“从禽”造成“巷无行人”,而左思《蜀都赋》认为蜀人是“乐饮合夕,一醉累月”,显现出汉晋时巴蜀人好游乐之风之盛。我们也发现汉代四川的画像砖石中有大量的宴饮游乐场面,显现了典型的生活世俗化风格,与北方画像石砖以伦理说教为主的风格差异明显。

唐宋时期,巴蜀的游乐之风在全国已经是声名在外。韩琦《安阳集》卷五称:“蜀风尚侈,好遨游。”《儒林公议》称“蜀人性游侈”。当时城市中往往是“俗尚嬉游,家多宴乐”^[1],而“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2]田况《成都游乐诗》称“四方咸传,蜀人好游乐无时”,一说明蜀人游乐之风已经在外声名很大,有“四方咸传”的声名。一说明蜀人游乐确实是玩得疯狂,故庄绰《鸡肋篇》卷上称“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据记载宋仁宗时,准备命宋祁为益州守,宰相以宋祁生性好玩,本来“蜀风奢侈”的声名就是十分显眼了,让他去当只会助长这种游玩之风,故坚决反对^[3]。

而且从唐宋以来,蜀人游乐的平民化就十分明显。

任正一《游浣花记》:“虽负贩刍蕘之人,至相与称贷,易

* 收稿日期:2008-09-19

作者简介:蓝勇(1962-),男,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西南地方史。

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4]无独有偶，《宋史》卷257《吴元载传》“蜀风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为了游玩贫民百姓借钱卖物也要游乐一番，真是一个苦中取乐，悠然自得之风。难怪苏东坡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将巴蜀平民勤劳吃苦而乐达喜玩的风尚描绘得活灵活现。

这种风俗到了明清风气依然。正德《四川志》卷9仍称人们“尚滋味，乐嬉游”，清代成都仍有“名都乐园”之称。只是可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明清时期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下降，这种喜游乐的风气在全国的声名相对不是那样显眼了。

当然要指出的是，巴蜀这种好游乐之风的平民化特征下，往往与博戏普及率高相关。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

（梁州）士多自用，聚会宴饮，尤足噫钱之戏。

这里的“噫钱之戏”为何物？《后汉书》卷34《梁统传》：“（冀）能挽满、弹棋、格六、推蒲、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唐代李匡义《资暇集》卷中《钱戏》称：“钱戏有每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所云意钱是也，俗谓之‘推钱’，亦曰‘摊铺’。”宋人洪迈《容斋五笔》卷1《俗语有出》也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推’，即摊钱”。显然这里噫钱为古代一种流行的博戏。我们注意到《隋书·地理志》中对每州风土进行了一个高度概括，这种概括应该是当时每州风土中最有特点之处。在对众多州的概括中，唯一对梁州有这段好闲嗜赌风尚的记载，可见中古时期巴蜀的赌风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了。

据记载刘宋时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5]少年臧质正是随其父在蜀郡牛脾县（今成都简阳县）长大的，当地的巴蜀喜博的社会环境可能对他影响十分大。唐代侯白《启颜录》记载封抱一在做益州九陵（今四川彭州）尉时，“与同列戏白打赌钱”^[6]，当时官员也经常参赌。杜甫《夔州歌十绝句》诗中称三峡一带“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7]，而下层船工们在休息时也不忘记在险恶的浪边玩一玩摊钱之戏，可见赌风之盛。五代宋明以来，此风仍然不衰。

宋代庄绰《鸡肋篇》卷上：“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这种用骰子的“撼雷”之戏显然是一种当时蜀中流行的博戏，在民间娱乐中较为普遍。而宋代《悼蜀诗》“斗鸡破百万，呼虚纵大噓”^[8]，也反映了当时蜀中的赌风之盛。

清代以来，巴蜀赌风在“湖广填四川”后，南北大量移民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

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谈到清嘉庆时成都上层人“多有饮赌为常事者”，而民间“踢跟劈蔗斗鸡场，杨柳黄时扯响簧。岁暮痴心愧无色，鹤鹑赢得便辉煌”。自注为：“取羊跟骨分作六面，一面输，两面空，三面赢，名曰踢跟，始

自回人。又俗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扯响簧’之语。”所以，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也称当时成都人“闺人好斗叶子戏，男子喜赴赶羊场”^[9]。

清末民国时期，成都赌风更盛。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成都人之性情积习中第一位是“子弟好赌博”，连小儿玩的许多游戏中也充满赌意，如碰钱、扎翻、扮钱、圈、打换子、弹香棍、转井、摹字、喂偷仓、喂蜡嘴、划甘蔗、喂鹤鹑、打蟋蟀、猜橘子、穿柑子、打石。据《成都通览》记载的赌戏繁多，掷升官图、掷状元红、掷羊子、掷五莽子、掷老猴子、摇十出头、摇单双、麻雀宝、诗宝、盒子宝、打棋牌、洗浆胡、门十四、打掀、沾沾湖、打招、字牌、套公牌、大二牌、打京、牌九、打丁八块、王会牌、打十八块、打乱出、打拐子连、打七红、打百子胡、掷撑、摇宝、拌钱、撞钱、扎翻手、宝摹字、掷十二像、升官图、猜钱、弹胡豆、夺标等。所以清末《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妇人“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好斗麻雀者十分之八，好游庙者十分之七”。这里的麻雀，即今天的麻将。所以《成都通览》提出“著名害人赌棍，应认真随时拿禁”，提出禁止官场“烟瘾及麻雀”。

当时川东重庆一带，仍流行传统的摊钱，清张乃孚《巴渝竹枝词》：“最嫌小艇沿江叫，白昼摊钱送上关。”^[10]清末民国川东合川一带赌风也盛，上层多以麻将、扑克、长牌为主，多在茶社、家中、俱乐部赌，下层百姓多以骰子、红宝、牌九、十点半、单双为主，赌博地点较为繁杂^[11]。荣昌一带赌风很盛，名目繁多，赌场遍及城乡^[12]。川南一带流行纸牌大二，有人在“泸州名堂”大二牌打法之外发明“合江名堂”打法，成为川南独特赌法^[13]。川南民间“掷博呼卢百戏饶，赌虽酒食有明条。如何相率摊钱去，又向屠门作估标”，记载连“屠户悬肉于竿，令众猜之，以定胜负，名曰‘估标’”可见川南赌风之盛^[14]。有的地方赌场美称“俱乐部”^[15]。四川的其它地区赌风也盛，雅安一带大家小户有赌具，街头巷尾有赌场^[16]。彭县一带赌博之风遍及城乡^[17]。开江县一带虽无大赌场，但城乡茶楼酒肆或宴会中赌博风特盛，农村流行“跌石三”赌法，城镇则以红宝、牌九、麻将、扑克为主^[18]。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城乡大凡红白之事都要聚众玩赌，民间有所谓“大事闹三天，小事闹三天，赌亦闹三天，不赌不闹不喜欢”。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四川、重庆的民间。

实际上清末民国时期的巴蜀的麻雀牌是从下江一带传来，在清末民初才开始在成都流行，因当时麻雀牌是竹节做成，赌玩要有响声，影响市民，官府曾一度禁止。不过，麻雀牌传到四川后，立即风行全川，张绍先《成都竹枝词》称当时成都“宴客宾朋斗麻雀，陪场端又叫裙钗。输赢动以千万计，挥霍如斯实乱阶”。到花会时往往“摊开麻将任郎搓，休到会场惹祸罗”，连一般百姓也“又嫖又赌又烧烟，资格桩桩要闹全。试问外边弥漂亮，家中可有半文钱”。

民国时期的成都，以麻将、扑克、纸牌、牌九、骰子为主，不仅有专门的赌场（分成明堂子和暗堂子），而且是利用各

种宴会聚会之余赌,沿袭了传统,在家宅、店铺、银行有时也变成赌场。特别是成都赌风之盛,不在赌场之大之多和赌资之大,而在于赌博普及程度之高在当时全国罕见^[19]。

《解放前成都的赌博》这样写道:

那时成都还有成千上万的小赌会。地主、官僚、巨商们在外面赌,他们的太太、小姐们成天无事,出人头地关门“杀家鞑子”外,又互相请亲戚朋友来家赌钱混日子。商店里面前面营业,后面赌钱,赌博角有店员,也有常来的顾客。学生在寝室里赌钱;教师也在课堂下班后就到赌桌上班。兵营里每连每排都有小赌场;旅馆里旅客在房间里赌,茶房工友在过道上赌。茶馆里长天有人打纸牌、麻将;餐馆宴客,更有以赌博作留客等客消遣。工厂作坊,很多任务人的工资都送到赌桌上,他们除赌钱外,也没有别的正当娱乐可享。黄包车夫、搬运工人,不吃鸦片烟的就爱赌钱,晚上有的熬通宵,除把血汗工资送进别人的荷包处,有的还熬夜成病,送了性命。整个成都,简直就是一座星罗棋布的大赌场。^[19]

为此,民国时黄炎培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成都人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半文将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赌风虽盛,但不在于赌场、赌资的巨大,故经济意义上的豪赌大博并不明显,巴蜀赌风表现为城乡普及率很高,人们休闲博戏的频率较高,赌博的地点随便,巴蜀地区的赌博更具有典型的休闲娱乐功能,在全国特色鲜明。

为何全国巴蜀地区休闲赌风最盛而且特色鲜明呢?我们发现,这是与巴蜀的历史与环境相连接的。从历史上来看,四面临山的四川盆地,在传统冷兵器时代,当中原战火不断时,从来都是一个中原逃避战火的安身地。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汉代成都平原就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四川盆地,处东亚大陆亚热带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汉代就有“民食稻鱼,亡凶年忧”^[20],所谓“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21]。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基本生存容易,空闲时间充足,而相对闭塞的环境,信息相对稀少,又使人们一时无

法走向外界,自古就养成小乐即安、小富即足的传统,生活节奏较慢,人们“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22],形成“狂佚务娱乐”之风。历史文献中关于“蜀风奢侈”、“蜀风尚侈,好遨游”、“蜀人游乐不知还”、“蜀人好游乐无时”的记载不绝。所以,《岁华记丽谱》认为蜀地是“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游乐之时,玩弄博戏,消磨光阴,会聚朋友,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刘锡. 至道圣德颂·全蜀艺文志[M]:卷 45.
- [2] 张唐英. 蜀梼杌[M]:卷下.
- [3] 费着. 岁华记丽谱·巴蜀丛书:第 1 集[M]. 成都:巴蜀书社,1988:103.
- [4] 任正一. 游浣花记·成都文类[M]:卷 46.
- [5] 宋书[M]:卷 74. 臧质传.
- [6] 太平广记[M]:卷 229. 封抱一.
- [7] 杜工部诗集[M]:卷 17. 夔州歌十绝句.
- [8] 张咏. 乖崖集[M]:卷 2. 悼蜀四十韵.
- [9] 林孔翼. 成都竹枝词[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6-57.
- [10] 张乃孚. 巴渝竹枝词[M]//林孔翼. 四川竹枝词.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
- [11] 合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合川县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12.
- [12] 荣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荣昌县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007.
- [13] 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泸州市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1290.
- [14] 翁傅宗. 南广杂咏[M]//林孔翼. 四川竹枝词.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03.
- [15] 纳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纳溪县志[M]. 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542.
- [16]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雅安市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90.
- [17] 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彭县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45.
- [18] 开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开江县志[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692.
- [19] 侯少宣等. 解放前成都的赌博[J].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 辑.
- [20] 汉书[M]:卷 28. 地理志.
- [21] 华阳国志[M]:卷 3. 蜀志.
- [22] 隋书[M]:卷 29. 地理志.

责任编辑 张颖超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ambling Addiction in Ba Shu Area

LAN 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aShu people were fond of traveling and gambling games, and this custom prevail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record in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people in BaShu had a liking for gambling games, such as Yiqian. Since the immigration from HuGuang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to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move from south and north to live in Sichuan, with plentiful various gambling games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In BaShu, Chengdu plain was the most popular area of the common practice of gambling gam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is custom is still prevailing today, but unrestrained gambling spree was not obvious financially, while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was more often the purpose.

Key words: BaShu; recreation; gambling addiction